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上)

[法]雅克·德里达◆著
夏可君◆编
胡进华◆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上)

[法] 雅克·德里达 ◆ 著

夏可君 ◆ 编

胡继华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 / (法)德里达著,夏可君编;胡继华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53-9

I. ①友…

II. ①德… ②夏…

III. ①德里达,D.—政治哲学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6283号

《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上、下)

著 者:(法)雅克·德里达

编 者:夏可君

译 者:胡继华

责任编辑:崔文辉 陆 雨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4.25 字数:476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53-9

版 次: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



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 60 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 60 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 30 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 20 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 80 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 80 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 80 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 年 9 月 28 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目 录

友爱的政治学

引言	003
寡头政体：命名，枚举和计算	010
友爱之爱：也许——作为名词和副词	041
这个疯狂的“真理”：友爱的正当名称	071
幻影朋友之回归	103
论绝对的敌意	148
誓言，魔咒，博爱	179
他，伴我同行.....	217
反弹回文	246
“人类语言中的博爱.....”	285
“人性历史上第一次”	338

附 录

法律的力量	387
马克思和儿子们	461

人文译丛

友爱的政治学



引 言

这部论著类似于一篇长序。我们不如干脆说，它就是我希望有朝一日将要撰写的一本书的导言。

它的目前形式，是以一个感叹句——“哦，我的朋友们……”为开篇，这种形式是一次讲演的形式。那仅仅是在1988—1989年，我以《友爱的政治学》为题在一期研讨班上发表的第一篇讲演——对此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几乎就是碰碰运气而已。毫无疑问，酝酿这么一篇导论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但无论其多么漫长，在整个论证过程之中，不管是它的论证节奏，还是它的逻辑框架，亦或是它的大部分内容，其每一论证步骤都得到了彻底的尊重。因此，这就不仅说明了这一计划为什么采取了如此幼稚的形式，而且给予了这种形式以合法性：它是准备性的，而不是问题式的。

我希望为未来出版的著作准备一系列专题研究，而在撰写专题研究之中，本书的主题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一篇孤立的开篇讲演，因为它预设了这一系列研究的前提和视界。如果说，回顾这一计划的逻辑发展决非徒劳无益之举，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在此之前的研究则直接集中于两大论题：“民族性和哲学民族主义”（1，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 [1983—1984]；2，法律，言语，原则 [1984—1985]；3，神学政治 [1985—1986]；4，康德，犹太人，日尔曼 [1986—1987]）和“吞噬他者”（野蛮主义的修辞学）。尔后的系列研讨则是通过秘密与见证的经验对责任问题展开探索。

在这里我之所以要从众多的讲演之中分离出一篇，而且单单要分离出



第一篇，无论是出于计谋还是出于简便，这都是事出有因：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原因，这篇讲演引起了几次学术研讨会的激烈争论。^①而且，这篇讲演已经以略为不同的、大致摘要的形式在国外发表了。^②在1988—1989年这个学术年的课程之中，每一次开始上课，我都引用蒙田的名句——“哦，我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而蒙田又声明他引用的是常常被归属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一个观点。一星期复一星期，这个句子的语音、语调、诵读方式以及解释策略都被反复地试探，为的是看看对它的解释能否激起灵感的火花，看看这一生动的场景能否栩栩如生地活跃起来。虽然时过境迁，目前这部论著也仅仅是重演和再现了第一次讲演而已。这种再现所重复的，与其说是第一场戏，还不如说是一次预演。这种预演之戏显然不是原始场景，尽管朋友的形象带着兄弟的面孔（而兄弟在这个分析过程中占据着十分关键的地位）如此频繁地出没于舞台，尽管朋友总是自发地归属于一种家庭至上、兄弟优先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学。

为什么朋友应该像兄弟？让我们梦想这么一种友爱吧！这种友爱超越了同宗的两个人之间的亲近感，超越了血缘关系，超越了最自然和最不自然的亲子关系，从一开始它就在名字上留下了它的签名，就像在这么一对朋友的双重镜像上留下它的签名一样。让我们问问自己：这么一种“超越博爱（兄弟关系）原则”的政治学可能是什么呢？

这种“政治学”还配得上政治学这个名称吗？

无疑，这个问题对一切“政治体制”都是有效的。但是，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个问题对于所谓“民主”的政治体制特别严峻——如果我们在最起码的意义上仍然用“民主”来理解这么一个人人共知而且总是问题重重的政治体制的话。

如果没有国家对家庭的某种依附关系，如果没有所谓的谱系模型——血统，种族，性别[Geschlecht]，血缘，出生，自然，民族，无论这种谱系是乡土的还是全球的，是否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总之，如果没有这种谱系模型，政治概念几乎就不能自我表达。它反复显示为深渊一般的问题——涉及到自然兴现[φύσις]，涉及到存在，涉及到出生之中的呈现，

开端之中的呈现，哺育和生长之中的呈现，被动创造之创造活动之中的呈现。这不就是生命么？这就是生命为了获得承认而被思考的方式。

如果任何一种国家逻辑都不能同它的压抑之物决裂和从压抑之中提升出来 [ce dont elle relève]（提升出家庭、市民社会的生命），如果政治学在其自身之内绝对不会削弱国家对家庭世代的依附关系，如果一切理想国的预言家的格言几乎永远是将博爱（兄弟关系）与自由、平等相提并论，那么，就民主制度而言，在博爱共同体^③或者在兄弟情爱缺席的状态下，它几乎是无法确定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通过一个形象，都大致无妨。但为什么是这个形象呢？

如果没有这么一种最起码的可能性，即假如我们乐意提醒人们注意“民主”一词的隐含色调，那么，民主化的可能性常常类似于博爱化（兄弟关系的生成）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民主就几乎不能自我再现。兄弟专制可能包括姻亲和姐妹，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理解，这种包括也就意味着化解她们的性别，使她们中性化了。包括，可能就是带着“最高的善意”强制人们忘记：姐妹绝对不能作为博爱概念的家庭化典范。这就表明，博爱概念为什么必须转化为家庭化概念，以及我们为什么必须接受整个的政治教化。在提出姐妹问题，将女人造就成姐妹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姐妹被造就为兄弟的特例了吗？这可能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虽然我们常常在别的场合，沿着历史上的安提戈涅（无论她是否家庭化）的漫长线索，反复地将她传唤出场，进入被讲述给我们的几千年的兄弟历史，但是，此时此刻，我不想这么做。

我们知道，民主化与博爱化之间的联系（也许，这种联系在当今已经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常常不可能也不一定还原为父权制。在该制度之中，兄弟们一开始就梦想尧舜禅让。父权永远不会停止这种开端梦想。尧舜禅让，权力平稳过渡的梦想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幽灵一般地萦绕着父权原则。

在这一原则的中心，同一永远对自己实施强暴，永远保卫自己而反对

他人。

因此，我们原则上也应该思考特定的政治犯罪，虽然在这个讲演之中我们对政治犯罪只字未提，即使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过它。

我们没有必要提及那些被叫做政治犯罪的犯罪，那些具有政治动机的暗杀，这些犯罪使卑微的历史承负了太多的死亡。我们不如提出第二个假设：一种对此等犯罪的思考，既承认一种压迫存在着差别，又认为，最强劲的政治学传统之中，政治学的政治性存在，以及政治学的概念，都是被构成的（如被“杀”的敌人之“现实可能性”，对于这个概念我们要花许多时间来探索；施米特就是在这种“现实可能性”之中认出了真正的政治；同时，他还在绝望之中希望将这种杀敌人的“现实可能性”与犯罪和谋杀区分开来）。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除非我们一定要思考反政治可能性的犯罪，反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类的犯罪，停止行动去检查政治 [arraisonner la politique] 的犯罪，把政治还原为其他事物并阻碍它走向应然存在的犯罪。

我们不妨说：这就是三种犯罪，三个假设。它们非常不充分地引出了友爱篇章的前奏。一篇引言可能作为权宜之计，堆积了全部悲情 [grief] 形象。“悲情”，在法语之中，不仅可以被理解为破坏、谴责、偏见、不公平或者伤害，而且可以被理解为控告、怨恨、哀怨、呼吁惩罚和复仇。在英语中，该词的本来含义是痛苦和哀悼，但“悲情本身 [grievanc]”也表示控诉、不公平、冲突、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一种必须修理的暴力。

“哦，我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这也许是一种控诉和一声哀叹。自己控诉自己的人之控诉，或者他者之控诉，对他人的控诉。但是，如果我们正在对朋友们说话并通告他们“根本没有朋友”，那么，这种关于他者的控诉又是向谁诉说的呢？如果这些人不在场，不存在，不在现在，也不再活着，那么，是不是只要接受这种控诉、注定要承认这种控诉呢？是不是只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去理解这种原汁原味却没有归属的引语？



除非，他们，那些为数不多的朋友，必须到来。

有多少呢？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

（是的，为数不多。亚里士多德个性鲜明地坚持认为，朋友必须数目稀少，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是这个朋友的朋友。

——为数不多，但什么是为数不多呢？它在什么地方开始，又在什么地方结束？一？还是一加一？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或者什么也没有？你说从全体男女开始、从一切人开始，这又是什么意思？民主制度要计算吗？

——民主计算，它要计算选票和公民主体，但它不计算、也不应该计算日常的单一个体：对到来者没有数字规定 [numerus clausus]。

——也许仍然有必要，但是有所区别地，于此于彼皆有区别地，即分门别类地进行算计。）

惟恐他们，不论多少，这些朋友们也许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惟一的朋友就足以接收这么一个句子；但是，这些朋友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仍然都不可能单个地成为这句话的接收者。他们的使命就是为这个句子反签名，赋予它出现的可能性，而且每一次反签名都永远是第一可能性和惟一可能性。因此，每一次反签名都是最后的签名。

但是，这必定一直在经历犯罪，经历我们所说的三种互相排斥的犯罪。因为，在悲情境界之中，在这些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犯罪之间，在这些归罪和再次归罪之间，在这些悲情形式之间，我们也许只有惟一的选择。控诉和来自无限伤痛的哀悼，混合在悲情之中。除非在这些可以归咎的犯罪之间，在对罪行的怨恨、责任、同情、遗嘱以及幽灵之间，——在这些永无止境的传讯和永无止境的审判之间，就仿佛什么也不可能发生，也没有什么值得思考。

归咎性的无限深渊，向每一个人的死亡和一切人死亡的事件的阴影之中的哀悼敞开。这些死亡事件总是可能将它们的界限推至无根底之根底。在法律、政治以及技术生物学的边缘，它们可能要吞噬这种非常基本而且



在当今显得异常不可靠的差异。这些差异空前令人困惑，前所未有的脆弱。我们能确保可以在死亡（所谓自然死亡）与杀害、完全的谋杀（一切反生命的犯罪，无论这种生命是否纯粹是“动物生命”，同时想想我们是否知道生命活动在什么地方开始，在什么地方结束）与自杀、自杀与种族屠杀（首先是发生在代表种类的每一个人身上，然后超越个体：一场种族屠杀、种族屠杀本身以及种族屠杀的类似物究竟从什么数目开始？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反思的中心会存在数目问题？什么是一个种族？为什么种族屠杀仅仅关乎“人类”的一个种、一个种族、一个民族团体、一个国家、一个宗教共同体？）、自杀与（我们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反人类罪以及战争、战争罪（我们知道这也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和反人类罪之间做出区分吗？所有这些区分在法理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们越来越没有效用；不仅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这些区分都丝毫不能改变受害者概念或者敌人概念——换句话说，根本改变不了悲情。

接下来要问问我们自己，什么是一个决断？谁做决断？一个决断是否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具有主动自由意志、具有主权独立性质？如果我们保留这个词语却改变了它们的终极规定，那又可能如何？还要问问我们自己，谁在这里制定了法律？谁将生命权利确定为一条法律？还要问问我们自己，是谁授予或者赐封了所有这些区分权、所有这些保护权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制裁权？它是一个活的存在吗？一个活的存在，就纯粹是活生生的和现时的生命活动吗？是一个活的现时吗？哪一个活的现时？是人类还是上帝？哪一个人？为谁存在？向谁存在？谁的朋友？或者谁的敌人？

“哦，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以这么一个呼语为开篇，这部论著确实可能仅仅是让人们听到一声呼唤。如果这声呼唤的名称被删除，那么，本书就纯粹是为了在一切目的地被确定之前再次呼唤这声呼唤。这声呼唤的目的地被确定在它的可能性之中，被确定在一些耳熟能详的句子之中。两个惯用词语将这些句子联系起来，这两个词语是诉求和飞跃 [faire appel, prendre appel]。





“诉求”的决断必然需要一种再度审查的程序。这就会对被下达的判决、对判决的给予、以及最无疑问的政治概念以及对友爱的标准解释提出的控告，同样也会对博爱化运动产生悲情。在另一个见证的代理面前，期望抗诉和争议，也就是期望提出诉求。

至于“飞跃”之中的驱动力，这就是在跳跃之前、目无视界、超越一切形式的尝试，蜷缩着一副柔软的躯体，在预备性反应之中首先把自己折叠起来。

注 释

①特别要提到两次：一是1988年华盛顿“美国哲学学会”，二是布拉格“法兰西研究所伽安·荷斯学会”的专题研讨会。

②本文以论文形式在国外发表的情况：（1）《友爱的政治学》用英语发表于《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LXXXV卷，11号，1998年12月，纽约；该文篇幅更长的一个版本用英语发表于《美利坚意象：精神分析与文化研究》（American Imago: Studies in Psychoanalysis and Culture），第50卷，1993年春，巴尔蒂摩，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爱之研究》（Love）专号，主编者为汤姆斯·基南（Thomas Keenan），译者为G. 默茨金（G. Motzkin），M. 西罗汀斯基（M. Syrotinsky）和汤姆斯·基南。（2）该文用意大利语发表于Aut Aut，米兰，1991年3—4月，242，译者为M. 法拉利斯（M. Ferraris）。（3）该文以一本书的形式用捷克语出版，Politiky Pratelstvi，译者为K. 忒因（K. Thein），哲学丛书，布拉格，1994年。

③“共同体”，我们也建议翻译为“共通体”。有时并列出现，请读者一直注意它的双重含义，参看Jean—Luc Nancy对这个词的相关思考以及我们的翻译。——校注